

A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主 编 张广智

本卷作者 易 兰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五卷 近代时期（下）

19世纪

19th Century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五卷 近代时期(下)

19世纪

19th Century

主 编 张广智

本卷作者 易 兰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五卷 近代时期(下)/张广智主编;易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9-08447-4

I. 西… II. ①张…②易…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近代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7619 号

西方史学通史 第五卷 近代时期(下)

张广智 主编 易 兰 著

责任编辑/关春巧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3.75 字数 387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47-4/K·354

定价: 4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19 世纪被誉为“历史学的世纪”。在这一个世纪里,各具特色的史学流派繁衍、惊才绝艳的史家辈出、玄妙睿智的史学思想喷涌、流芳千古的史著纷现,将整个 19 世纪演绎成历史学无与伦比的盛世华章;在这一世纪里,德国史学、英国史学、法国史学,以及大洋彼岸的美国史学异彩纷呈,为西方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色彩与新气象。特别是德国史学,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流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其他诸国史学发展影响至深,成为 19 世纪西方史学中难以逾越的丰碑。

历史学之所以能在 19 世纪的西方尽情绽放,正是因为它植根于 19 世纪西方深厚社会土壤之中。19 世纪的历史学应 19 世纪之时势、借 19 世纪时代之东风、驭西方思潮之巨浪,由身份未明的一门学问一跃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门科学;在 19 世纪里,史学工作者依托社会革命、思想变革的浪潮,借助各大高等学府、科研院所的兴盛与发展,由退休的将军政客、学识驳杂的博物学者等业余人士转变成经过史学专门训练的史学专业人才;史著由充斥着个人回忆录、未经考证材料的作品,转变成严格建立在经过查证考订史料或第一手档案文献基础之上的著作;历史专业期刊杂志从无到有,再到蔚然成风;史学思潮由相互决然对立转变成既各具特色又有千丝万缕联系。此外,哲学与历史学之间也由此前的主从关系转变成相辅相成的关系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昭示着 19 世纪这一新世纪孕育了历史学的新发展,而 19 世纪历史学的每一点滴的转变都是根源于新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

一、19 世纪的西方社会

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给整个欧洲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资本主义的世纪

19 世纪的欧美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欧美等国资本主义工业化逐步普及,生产效率大幅增长;资本主义经济势力逐步壮大,并最终主宰着整个 19 世纪的西方经济。

在这一时期,始于 18 世纪 60 年代的英国工业革命向纵深发展,英国经济在 18 世纪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农业方面,1830 年的棉花产量比 1796 年增长了 16.5 倍。英国工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纺织工业方面,纺织工厂从 1787 年的 143 家发展到 1835 年的 1 263 家^①。矿冶方面,生铁产量从 1796 年的 12.5 万吨增加到 1840 年的 142 万吨。煤产量则在 1800—1840 年期间共增长了 12.8 倍^②。到 1851 年,英国的煤产量已占世界煤产量的四分之三,棉纺织品产量和生铁产量均占世界产量的一半以上^③。1841 年英国工业总收入就已经达到 15 550 万镑,位居世界第一^④。由于科技进步及机械生产的普及,英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逐年攀升,从 1803—1812 年期间的 38.4 英镑攀升到了 1885—1894 年期间的 75.0 英镑^⑤,居世界首位。

肇始于 18 世纪的法国工业革命也带来了经济飞速发展,但法国革命后社会动荡不安曾一度使得经济发展减速。到 19 世纪后,法国经济又出现较强增长势头,特别是从 1815 年开始,法国经济增长加速。其中,1815—1860 年时期,法国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高达 2.5%—3%;1820—1860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近 2 倍^⑥。虽然 1847 年法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没有改变法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向。在 1850 年之后二三十年里,棉花消费量增加 1 倍,生铁、煤的产量增加 2 倍,铁路里程长度增长 4 倍;法国工业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2.7%,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2 倍^⑦;

① David C. 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783 - 1832)*, Vol. 11, London, 1959, p. 512.

② D. H. Willsen, *A History of England*, New York, 1972, p. 551.

③ 王明元:《新编世界近代史》(上),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3 页。

④ Phyllis Deane, W.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 - 1959*, Cambridge, 1962, p. 366.

⑤ Caglar Keyder, Patrick O'Brien,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 - 1914s: Two Paths towards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1978, p. 91.

⑥ Beltran Alain, Griset Paseal,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1815 - 1914*, Paris, 1988, p. 10.

⑦ 钱乘旦:《现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1 页。

法国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8%，国民收入增加 1 倍^①。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法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由 1803—1812 年的 48.3 英镑攀升到 1885—1894 年的 74.3 英镑^②，仅次于英国，位居世界第二。

即便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德意志地区在 19 世纪也开始步入工业化道路。特别是在 19 世纪 20、30 年代的产业革命中，德意志在新材料、新动力等方面急剧发展^③，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工业生产发展重要指标——生产资料增幅而言，1830—1840 年德意志工业中生产资料增长 61%^④。其中，1825—1835 年，煤产量年增长率将近 31%，1835—1869 年期间煤产量增长了 16 倍，整个 1830—1900 年煤产量共增加了 106 倍^⑤；生铁产量方面，从 19 世纪 50 年代起开始飞速增长，1869 年达到 131 万吨，1900 年达到 755 万吨^⑥。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加速发展，1870—1900 年，德国全部工业产量年平均增长达到 3.7%^⑦。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在 19 世纪工业生产迅猛增长。1810—1860 年半个世纪里，美国工业总产值增长将近 10 倍。到 19 世纪 60 年代，美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和煤、棉纺织品产量，都仅次于英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南北战争以后，由于国内社会政治环境逐步平稳以及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美国工业生产快速增长。从 1859 年之后的四十余年间，美国工厂总数增长了 3.65 倍，从 14 万个激增到 51.2 万个；煤产量增长 7.9 倍，从 1820 万吨增为 1890 年的 14 300 万吨；铁产量增长 9.35 倍，从不足 100 万吨上升到 935 万吨；钢产量增长 435 倍，由 1 万吨增到 435 万吨；美国工业生产总

① Beltran Alain, Griset Paeal, *La Croissance économique de la France 1815 - 1914*, Paris, 1988, p. 12.

② Caglar Keyder, Patrick O'Brien,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and France 1780 - 1914s: Two Paths towards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1978, p. 91.

③ Franz F. Wurm,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in Deutschland 1848 - 1948*, Opladen, 1969, S. 59.

④ Toni Pierenkemper, *Die Industrialisierung europäischer Montanregionen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2002, S. 211 - 221.

⑤ Colin Heywood, *The challen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me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80 - 1830), edited by Pamela M. Pilbeam, Routledge, 1995, pp. 151, 169.

⑥ Brian R. Mitchell, *European historical Statistics (1750 - 1970)*, London, 1978, pp. 325 - 327.

⑦ Alan Milwar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es of Continental Europe 1850 - 1914*, Harvard, 1977, p. 26.

值增加4倍,并于1894年超过英国,跃居世界首位^①。

经济上一直处于欧洲末流的俄罗斯在19世纪也实现了经济的大幅度增长。1804—1830年棉纺企业增加1.7倍,工人数量增加8倍,产量增加了14倍^②。1850年之后,俄国手工作坊式工业过渡到机械化工业生产后,生产能力大幅提高。特别是俄国1861年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调整的要求,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中,1860—1879年,俄国机器制造企业增加近1倍,产值增加了5.5倍,平均每个企业产值增加了7倍^③。此外,意大利、波兰、瑞典等国也陆续步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大潮之中,或多或少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仅使资本主义这一先进的生产方式在欧美国家得以确立,而且还使其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逐步积累了向外扩张的物质力量与军事力量。工业革命完成之后,甚至早在工业革命进行时,欧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对外展开大规模的侵略与扩张;在其坚船利炮冲击之下,亚非拉经济落后的国家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原料产地、劳动力供应地,从而以附庸的形式进入了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系统,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组成部分。必须指出的是,西欧列强在对外殖民过程中,把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科学知识甚至先进思想观念带入这些国家和地区。马克思曾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基础。”^④亚非拉各国原有的以封建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社会体制都受到了强烈冲击,甚至从根本上动摇了其政治经济体系,从而使得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大体而言,欧美列强的对外扩张,一方面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另一方面以武力打破亚非拉等落后国家的经济状态,使之被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之中,客观上促进了整个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前进步伐。

① G. C. Fite, J. E. Ree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56, pp. 187 - 370.

② 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69页。

③ 张广翔:《19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13页。

④ [德]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0页。

通过对内的工业革命、对外的殖民扩张,资本主义经济在 19 世纪成为压倒一切的经济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使得“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①。换言之,19 世纪在经济上最显著的标签就是“资本主义”。

2. “民主革命的年代”

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导致整个 19 世纪的政治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资本主义世界里民主革命风起云涌,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对外征服、法国七月革命、意大利的统一运动、德意志的统一战争、俄国 1861 年的改革、美国内战蓄势喷涌;而资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扩充力量,一步步击溃封建势力并最终取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资本主义制度在动荡中逐步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奠定并进一步夯实其统治基础。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增多,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英国宪章运动、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1848 年欧洲革命、巴黎公社等无不彰显着无产阶级的力量。在斗争中,无产阶级实现了由自发斗争到自觉革命的转变,从以单纯经济上的诉求为斗争的目的,发展到捍卫自身的政治权利,再上升到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再次,资本主义经济对外的扩张激发了备受奴役民族国家的反抗,这些国家高举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大旗,与欧美列强展开殊死搏斗。在 19 世纪里,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等跌宕起伏,引发了 19 世纪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

工业革命及其带来的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后果就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在产业革命中孕育、成长的这一新兴阶级——资产阶级随着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在政治上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②。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

① [德]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76 页。

② 关于 19 世纪资产阶级的变化,具体可参见 Jürgen Kocka, *Bürgertum im 19. Jahrhundert: Einheit und Vielfalt Europas*,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5, 或者 Jürgen Kocka, Allan Mitchell, *Bourgeois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translated by Gus Fagan, Berg, 1993。

资本主义经济在 19 世纪步入发展的高潮,这些都与欧洲原有封建贵族、封建制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两者之间的较量成为这一时期社会斗争的主要内容,不仅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而且还是影响整个 19 世纪欧洲政治格局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这种影响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现便是法国革命^①。法国革命最初实际上是把持着僧侣会议的教士阶层和掌控着各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的贵族们发动的;法国封建特权阶级意图利用政府危机,夺回被卡佩王朝剥夺的政治权利^②,但法国革命而后的发展趋势却脱离这些特权等级的掌控,背离了其初衷。随着革命不断向纵深方向演进,法国资产阶级借助其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或是通过腐朽封建机器的卖官鬻爵而进入统治阶层^③,或实现由自发参与革命到自觉引导革命这一转变,借助革命的狂潮清扫封建特权阶级,最终取代了封建特权阶级而获得政治上的统治权。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此前多为特权阶级把持的显贵阶层的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富有阶层跻身于显贵阶层^④。1801 年法国宪法就规定,各省选举团成员必须从纳税最多的公民中选拔,当选者即为当地的显贵;中央政府则从各省选拔提交的显贵名单中遴选相关官员^⑤。于是,手上聚集越来越多财富的新兴阶层——资产阶级凭借其财富而晋升为显贵,从政治上谋求统治地位以确保其经济利益。应该看到的是,法国大革命直至 1875 年通过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确立了共和政体这近百年时间里,整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安,但粉墨登场的各党派中都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干力量,所倡导的政治主张多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此后虽然法国各派政治势力依然围绕政权

① 英国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在其《革命的年代》中将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称为“二元革命”(dualrevolution)。参见〔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 页。

② Georges Lefebvre, *The Coming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R. R. Palmer, Princeton, 1975, pp. 1-2. 中译本可参见〔法〕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洪庆明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 页。

③ 详情参见 Elinor G. Barber, *The Bourgeoisie in 18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1955, pp. 25, 123-127; Albert Soboul, *La France à la veille de la Révolution*, Paris, 1974, p. 108; Georges Dupeux, *French Society 1789-1970*, London, 1976, pp. 46-62.

④ Jeremy J. Whiteman, *Reform, Revolution and French Global Policy (1787-1789)*, Ashgate, 2003, pp. 15-42.

⑤ 具体情况可参见 Fernand Braudel, Ernest Labrouss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I, Paris, 1976, p. 131; Fernand Braudel, Ernest Labrouss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III, Paris, 1976, pp. 841-866.

形式问题不断进行斗争,但资产阶级在工业革命中经济力量的增强,从而使得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这一切都源自法国资产阶级在这场民主革命中逐步掌握了革命的主导权,逐步清算、驱逐封建势力的影响,政治地位不断上升,从而使得革命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成为左右着整个欧洲的重大事件。这不仅是指几乎所有的欧洲列强都卷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之中,而且主要还是指拿破仑政权的对外征服活动。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法国军队在侵入他国的同时,也将法国的一些革命思想传入这些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封建制度的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在拿破仑金戈铁马的蹂躏下,整个欧洲的政治、经济局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①。这既是指欧洲大陆的封建专制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也是指欧洲的均势被彻底摧毁,欧洲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在 19 世纪初更加复杂化、激烈化。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与法国毗邻,又和法国有着复杂恩怨纠葛的德意志地区所受的冲击是最大的。拿破仑的军事入侵,加速了神圣罗马帝国体系的瓦解。经过拿破仑的军事征服,德意志地区的小邦数目大大减少,而残存的邦国大多按照法国的利益需要而建设其政权,德意志地区旧有的封建制度在这一革命风暴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②。此外,拿破仑的入侵及其推行的“大陆封锁”政策,使整个普鲁士陷入空前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政府意识到,“旧世界已失去魔力,它已不再适合我们了,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适应时代的新要求,用类似的方式将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我更新”^③。于是,普鲁士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消除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藩篱,实现国家的强盛,从而进入了“改革时代”^④。在施泰因、哈登堡的力主下,普鲁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新政,这不但使整个普鲁士“国家机器的中央集权程度大大提高”^⑤,具有了明显的资产阶级政权色彩,为普鲁士资本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还使得

① 拿破仑对外战争的影响,参见 Alexander Grab, *Napole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 New York, 2003, pp. 19 - 188。

② 吴友发、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9、61 页。

③ 同上书,第 60—61 页。

④ [英]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81 页。

⑤ 同上书,第 282 页。

普鲁士在欧洲的政治地位逐步上升,开始成为决定各种欧洲事务的重要力量之一。

法国资产阶级在波澜壮阔的革命风暴中成长,德意志地区资产阶级在反法斗争带来的改革中觉醒,而英国资产阶级则是在相对和风细雨的民主革命中在政治上不断壮大。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土地贵族执掌政权,而资产阶级只是作为其政权盟友^①。随着工业革命带来财富大幅增长,随着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经济实力不断壮大、社会经济地位日益提高,他们越来越难以容忍土地贵族对政权的垄断、政府对工商业的诸多限制^②,他们热切地希望主导国家事务,掌控国家政权。“1830年革命将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宪法(反民主的,但同样是反贵族),引进了西欧的主要国家”^③,英国资产阶级特别是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在此风潮下,经过反复的抗争与妥协,最终借由1832年国会改革而跻身于统治阶层,取得了与世袭贵族、乡绅阶层共同统治英国的权利^④。到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工业革命进入鼎盛时期^⑤,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也因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举世瞩目的经济成果而空前强大,其政治上的影响力也随之水涨船高^⑥。到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不但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也居于统治地位。在1851—1874年间,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曾执政长达19年之久^⑦。

此后,欧洲主要国家曾一度在1848年革命中风雨飘摇,但审时度势的各国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浪潮中纷纷夺得革命胜利果实,强化了其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不仅如此,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在19世纪50、60年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与改革运动的浪潮中都进一步增强了自身政治经济力

① Pérez Zagorín, *Culture and politics from Puritanism to the Enlightenment*, California, 1979 pp. 205 - 216.

② Patricia Hollis, *Class and conflict in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1815 - 1850*, London, 1973, pp. 102 - 117.

③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第408页。

④ John Collingwood Bruce, *The hand-book of English history*, London, 1857, pp. 158 - 159.

⑤ K. Theodore Hoppen,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1846 - 1886)*, Oxford & New York, 2003, pp. 275 - 315.

⑥ Alexandra Köhler, *Social Class of the Mid-Victorian Period and Its Values*, Grin Verlag, 2008, pp. 5 - 6.

⑦ K. Theodore Hoppen, *The Mid-Victorian generation (1846 - 1886)*, Oxford & New York, 2003, pp. 198 - 254.

量,以各自的方式确立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意大利人民高举民族解放旗帜,驱逐外国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市场,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石,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稳固夯实了基础;德国则以军事改革为铺垫,历经“宪法纠纷”,通过王朝战争完成国家统一。在此过程中,铁血政策表面上似乎是不顾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进步党人、无视资产阶级的诉求;实际上在这一系列的纠葛中,德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得到确认,而国家的统一大大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又在经济上确保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俄国则通过 1861 年改革废除了农奴制,自上而下地实行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一部分障碍,使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美国则通过南北战争击溃了南部种植园主的政治势力,借由“南部重建”进一步清算种植园主经济的政治影响,大力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工业资产阶级夺取全国的统治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 世纪的欧美资产阶级这些民主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

另外,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使得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逐步凸显出来,两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日趋明显。工业革命带来经济规模扩大,这一方面使得资产阶级财富增长、社会地位提高、权力膨胀,另一方面使得人数不断增多、队伍壮大的无产阶级遭受沉重剥削,变得一无所有。1875 年,普鲁士有机制造厂 1 169 家^①,职工人数 162 000 人^②,仅克虏伯公司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雇佣工人就达到了 7 000 人^③;英国 1835 年雇佣工人就达到 221 169 人^④;美国到 1899 年工人数达到 5 317 000 人^⑤;1860 年,俄国自由雇佣工人共 456 000 人^⑥,1880 年有 125 万产业工人^⑦,1900 年工人人数达 1 400 万人^⑧。仅 19

①② Toni Pierenkemper, *Die Industrialisierung europäischer Montanregionen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2002, S. 211 - 221.

③ Colin Heywood, *The challenge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mes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1780 - 1830), edited by Pamela M. Pilbeam, Routledge, 1995, p. 169.

④ David C. Douglas, *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783 - 1832)*, Vol. 11, London, 1959, p. 512.

⑤ G. C. Fite, J. E. Ree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1956, p. 369.

⑥ 张广翔:《19 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开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第 26 页。

⑦ 张广翔:《19 世纪俄国工业革命的特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第 14 页。

⑧ 张广翔:《19 世纪俄国政府工商业政策基本趋势》,《西伯利亚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46 页。

世纪 60、70 年代,欧洲工人人数就已达 847 万人,手工业工人 1 123.5 万人。而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却随着资产阶级财富增加、政治地位上升而日益恶化。对此恩格斯曾说过,“生产领域每前进一步,同时也就意味着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后退一步。对一个阶级的利益,必然是对别一个阶级的灾难,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别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①。不堪压迫的工人自发地参与到英国宪章运动中,懵懵懂懂地谋求政治权益,或是以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等“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②,或是以主力军的姿态在 1848 年欧洲革命中彰显自身巨大力量,谋求政治、经济权利。在 1871 年,法国无产阶级主导的巴黎公社革命,“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③,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到了 19 世纪晚期,在斗争中不断成熟的无产阶级自觉地组建工人团体,发起社会主义运动,向私有制社会全面宣战。

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对外扩张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族民主及民族解放运动。东欧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等与亚非拉等国的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汇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不断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将整个 19 世纪演绎成真正的“民主革命的年代”。

3. 自由与保守的时期

19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但在 19 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绝对统治地位之前,传统经济及传统政治势力仍很强大^④;即便之后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传统力量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视。这一态势使得整个 19 世纪的欧美世界在矛盾中前行:一方面 19 世纪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都带着旧世界的痕迹与影响,保守力量、保守的思想观念无处不在;另一方面新兴力量所特有的锐意进取使得自由

① [德]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70 页。

② [德]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483 页。

③ [德]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76 年版,第 587 页。

④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3 页。

成为 19 世纪最为时尚的口号。于是,自由与保守共存成为这一时期典型的思想特征。

这种矛盾的状态首先体现在 19 世纪的农民身上。在 19 世纪历次革命运动中,农民既能冲锋陷阵、高举革命的旗帜,同时又表现出极端的保守性。这一点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农民遭受封建迫害之时,他们成为最激进、最革命的力量,扫荡一切封建主义的残余——抗缴国王及贵族强征的赋役、焚烧封建契约文书、乡村暴动^①,不遗余力地摧毁封建贵族的经济力量与政治势力。当农民的赋税、土地要求得到满足后,他们就转变成成为抗拒任何变迁的保守势力。特别是当革命触及他们的部分利益之时,他们转身成为最坚定的保守力量,顽固地阻挡革命前进的步伐。1847—1848 年间,法国中部西南和东南部地区的农民曾发动了多起大规模的、攻击资本主义的、反对革命的骚动叛乱。正如勒费弗尔所指出的那样“农民革命是一把双刃的利剑”^②,清除封建主义的同时,也伤及资本主义。可以说,“极端保守的农民形象和作为革命力量的较为现代化的农民形象是同时并存的”^③。

其次,自由与保守的思想观念也同时出现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从 19 世纪资产阶级的构成来看,欧美国家的这一新兴阶层并非是一个完全根植于某种经济利益的社会阶层,其构成是有多种来源的。在法国,大革命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尚处于未成熟状态的资产阶级还无法独立支撑并引导整个社会变革,于是融合了新旧时代各种势力,集中了自由与保守各色人等的显贵成为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主心骨^④。从本质上而言,显贵虽然保留了部分旧的政客权贵,但 1830 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新兴阶层凭借财富上升为显贵,使得这一特殊阶层越来越具有资本主义代言人的性质^⑤。在英国,依靠工业革命而壮大起来的工业资产阶级在 19 世纪初力量依然是相当弱小的,无法独立占据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统治地位,只能依附于土地贵族、乡绅等旧世界的力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而传统的土地贵族、乡绅也在工业化

① [法] 乔治·勒费弗尔:《法国大革命的降临》,第 86—100 页。

② [法] 勒费弗尔:《法国革命史》,顾良译,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第 113 页。

③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86 页。

④ 具体情况可参见 Fernand Braudel, Ernest Labrousse, *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France*, Tome I, Paris, 1976, p. 131。

⑤ Guy Chaussinand-Nogaret, *Une Histoire Des Elites, 1700—1848*, Paris, p. 223。

的浪潮中转变角色,成为带有新世界资本主义性质的新阶层。此外,德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容克地主阶层与新兴富裕阶层之间角色的融合、美国工业资产阶级与种植园主之间的相互妥协等,这些都进一步促成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构成呈现出新旧驳杂的局面,而这种构成使得19世纪的资产阶级在思想上兼具追求自由又顽固保守这样矛盾的特点。

在这种状况下,19世纪的欧美世界精神生活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精神生活都要复杂”^①:一方面是不断地创建新的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又保留了一些历史特性,在思想文化上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德国的精神生活。德国固有的保守主义倾向在整个德国精神生活中地位独特。德国自三十年战争之后,残酷的战争促成了德意志地区一种奇怪的心理习惯——对权威的绝对顺服。早在中世纪早期,德国就被称为“顺服之土”,三十年战争无疑又促成了这种服从权威的习惯的滋长。战争的残酷性促使人们“心甘情愿去服从任何权威,只要这个权威看起来强大得足以制止他们身受过的恐怖,使之不再重现。他们毫无批判地接受他们的王侯的骄傲自大和狂妄的主张,并怀着遗传性的恐惧,生怕现存的社会关系一旦解体可能会带来后果;久而久之,这种甘心接受的态度似乎是正常的并起了传统的作用”^②。这股保守主义倾向反映在思想文化上就是对以往生活的留恋与追慕,理查·瓦格纳曾经说过,“德国人在思慕渴望‘德国的荣耀’中通常所能梦想的不外乎类似恢复罗马帝国那样的东西”^③。弥漫在德国思想界的这股守旧风气,经法国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在政治、思想上又转化为反对激烈变革的改革,而主张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现状。例如,普鲁士的改革派代表人物施泰因就曾说,“我们无需去摧毁所有的老传统,而是必须对它们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改造”^④。总体上而言,这种保守的倾向在19世纪初是德国最为明显的思想特征之一,也是影响德国人思想行为的重要因素。德国思想家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的保守性,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精神的根源。

综上所述,19世纪欧美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等层面上所有的情形及其特点,势必会深刻影响整个时代的方方面面。

①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63页。

② [美] 戈登·A·克雷格:《德国人》,杨立义、钱松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③ 同上书,第26页。

④ 转引自吴友发、黄正柏主编:《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二、时代进步与史学发展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方面的巨大变革以及思想上的特性必然对该时期史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1. 社会变革与史学契机

19 世纪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给史学带来新的发展契机。特别是“法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后的拿破仑政权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研究、写作和阅读的状况”^①，对 19 世纪历史学的发展影响巨大。

首先，法国大革命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并赋予很多旧历史问题以新的意义，促使人们再次将目光聚集在这些问题上。比如，“与法国大革命时代相比，以往时代的历史是否有意义，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时代与之后的时代之间有何联系”^②。法国大革命引发了欧洲整个思想界的思考。关于这一点，德国浪漫主义的旗手施莱格尔曾经说，法国大革命是“民族国家的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现象”^③。这一特定的历史事件成为众多学者思索的主题；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军事、政治、外交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同时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主题。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下，哲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场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从各个不同的视角对这一事件本身展开的研究。特别是 19 世纪历史学家纷纷著书立说，或是探讨法国革命中彪炳史册的革命伟人与思想巨子；或是总结法国独特的民族性；或是研究法国革命期间的社会政治；或是分析法国革命中的法律制度；或是阐述法国革命时期的经济文化；或是将法国革命与英国光荣革命进行比较，辨析两种变革方式的优缺点；或是结合本民族的需要，探求符合民族国家的政治制度或变革方式。比如，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费希特的《法国革命史》、卡莱尔的《法国革命史》、米什莱的《法国革命史》、米涅的《法国革命史》、梯也尔的《法国革命史》、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等。甚至是而后强调研究文化史的布克哈特也曾经以“法国时代的

① [美]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全球史学史》，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1 页。

② Felix Gilbert, *History: Politics o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Ranke and Burckhard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

③ 转引自[德] 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 页。

历史”为题展开对历史的论述^①。在 19 世纪,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或多或少关注过法国革命。当时整个学术界对法国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普遍关注,致使更多的学者投身历史研究中。这样一来,历史学界就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之势。此外,历史研究中的专题研究也在这些史学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其次,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整个欧洲社会身份认同的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史学的发展,并为历史研究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长久以来,欧洲社会都是以“阶级”作为“身份认同”的主要原则,不同等级各安其分,形成相对稳定的“封建秩序”。这一切都被法国大革命打乱了。革命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鼓舞着全欧洲人民去猛烈冲击森严的等级制度。这种对欧洲封建社会固有的秩序造成严重威胁的革命虽然很快遭到奥地利、普鲁士、俄国所组成的联军的镇压,但是其革命精神深入人心。法国大革命赢得了欧洲各国知识分子的好感,他们大声讴歌法兰西式的自由^②,而奥、普、俄的镇压行为也招致批评迭起。随后拿破仑军队横扫欧洲,这位“革命之子”恢复帝制,登上了法兰西皇帝的宝座,并将革命时期所标榜的精神弃之如敝屣。这些引起了知识阶层的反感,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反思法国大革命,对“阶级认同”产生了怀疑,转而强调“民族”,而身份认同也由此从水平的“阶级认同”转变成垂直的“国家认同”^③。民族、国家等观念在知识分子心中,乃至整个欧洲人民心中的地位日高。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政权的征服战争以及被征服国家的反抗这一过程,也向人们证明了民族主义的情感以及精神、信仰的结合是不会为外在压力所征服的。这一意识促使人们去关注民族国家过去的历史,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而变化了的身份认同方式也进一步引发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倾向于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这些现象在德意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念的角度来看^④,19 世纪的德意志民族与欧洲其他民族相比是非常特殊的:在构

① Jacob Burckhardt, *Jacob Burckhardt's Vorlesung über die Geschichte des Revolutionszeitalters*, Vol. 13, reconstructed by Ernst Ziegler, Basel, 1974.

② 当时在整个欧洲思想界颇具影响的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学者都纷纷表示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

③ 周惠民:《兰克与“普鲁士中心论”的形成》,《辅仁历史学报》2005 年第 16 期,第 9 页。

④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把民族看作为“一个历史产生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它具有四个特征,即共同的语言、领土、经济生活和在共同的文化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特征。斯大林主张,民族不仅由他们互相生活条件的不同来区别,而且也通过他们文化中的精神特征来分别,并且这四个特征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苏〕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斯大林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94 页)